

民国时期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

(历史与档案学院 吴鹏)

摘要：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纳粹分子发动了反犹运动，欧洲的犹太难民纷纷出逃。上海在当时也成为了许多犹太难民逃亡的目的地之一。随着难民人数的迅速增加，上海感到越来越不堪重负。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在西南边区建立犹太难民寄居区的计划。由于当时国民政府高层难以形成一个稳定而坚定的共识、计划的实施缺乏启动资金、严峻的国内抗战形势和重庆与云南之间的隔阂，以及国外德国和日本等因素的制约，使这项计划最终被迫搁置。但是这项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也应被视为二战期间中犹友谊的象征，其积极意义不应被历史所忽视。

关键词：云南；国民政府；犹太难民；移民计划；反犹运动

犹太民族是一支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同时也是一支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民族。在欧洲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排犹事件。德国纳粹分子掌权后，一步步加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驱逐。一批批犹太人被迫离开故土，在世界上寻求立足之地。上海就是当时犹太难民心中的“应许之乡（Promised Land）”之一。鉴于上海容纳犹太难民的人数有限，国民政府提出了在西南边区^①划定犹太难民寄居区的计划。尽管这项计划在当时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制约下终究难免被搁置的命运，它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的由来

（一）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与驱逐

欧洲历史上有排斥犹太人的事件，这在近代尤为明显。1933 年德国纳粹分子掌握政权后不久，就掀起了反犹运动的热潮。随着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越来越加重，一些犹太人感到自己即将大难临头，所以已经打算远赴他乡。

1938 年 11 月 9 日“水晶之夜”^②发生后，导致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纷纷逃往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938 年 3 月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也实行了反犹运动；英法等国由于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不愿看到犹太难民逃亡到本国，从而增加自身的负担。^③当犹太难民正准备逃往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时，1938 年 7 月 6 日来自欧洲、美洲等地的三十二个国家^④在法国埃维昂召开了国际难民会议，他们在会议上表示难以继续接收数量庞大的犹太难民。这次会议使更

^① 国民政府高层会议最后拟定在今云南腾冲和蒙自之间划为犹太难民的寄居区，因此本文称该项计划为“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

^② 1938 年 11 月 9 日深夜，德国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党卫军等化装成平民，对犹太人的商铺、住宅、教堂等进行严重地破坏，估计有 276 个犹太教堂被夷为平地，超过 7500 家企业被破坏，91 个犹太人被杀害。这次事件不仅使玻璃片碎了一地，也让犹太人的安全感跟着破碎了。它标志着纳粹分子反犹运动变得更加组织化，史称“水晶之夜”。参阅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35 页。

^③ 在这场经济危机中，英国工业产值降低了 23.8%，出口额减少了 66.4%，进口额减少了 62.2%，大约倒退到 1897 年的水平，失业人数占工人总数的 22.2%；法国降低了 32.9%，大约倒退到 1911 年的水平，失业人数占工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参阅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29-193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7-21 页。

^④ 这三十二个国家分别是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澳大利亚、阿根廷、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哥斯达黎加、丹麦、多米尼加、新西兰、委内瑞拉、瑞士、瑞典、巴拉圭、巴拿马、乌拉圭、墨西哥、尼加拉瓜、挪威、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爱尔兰、厄瓜多尔、秘鲁。

多的国家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①

中国历史上也有犹太人居住和生活。我们不但没有见到中国人反犹太人的事件，而且还看到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友好地相处在一起。^②这说明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是相似相通的。这样的历史文化渊源，证明犹太人来到中国是可以适应的、有安全感的。

到了现代，当犹太人遭到纳粹分子的迫害时，中国人民站在了犹太人的一边。1933年5月1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人）针对纳粹德国的反人类暴行，向上海的德国领事馆提出了强烈抗议。^③时任奥地利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认为，纳粹主义的暴行有违人道主义理念，进而毅然决然地向奥地利的犹太难民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国民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对犹太难民的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对纳粹分子的暴行进行了强烈地控诉。^④

（二）上海容纳难民的人数有限

自从何凤山向奥地利犹太难民发放签证后，逃往上海的犹太难民随着排犹浪潮的接踵起伏而不断增加。从1939年1月起，犹太难民以平均每周1000人的规模逃往上海。1933年至1941年间上海所接受的犹太难民在数量上最多的时候将近3万人。1941年底仍有2.5万人留在上海，这远比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和南非五国接收的犹太难民的人数多得多。^⑤

上海的犹太难民依靠犹太人协会以及其他慈善援助组织的帮助而勉强度日。许多人都住在棚子里，仅依靠汤肴厨房（soup kitchens）维持生活。^⑥犹太难民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涌入上海，无疑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治安产生负面影响。上海租界的人民表示，自己的生活因为犹太难民的到来而受到了严重地干扰，日常生活与管理也呈现出较为混乱的局面。^⑦上海的一些犹太社团和慈善组织，为犹太难民提供住房、食物、医疗等基本生活需要，还要帮助他们在当地寻找工作。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他们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主席斯皮尔曼在1939年4月23日的会议上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似乎无可救药。”^⑧上海的救济组织一筹莫展，上海的犹太居民有许多人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也和他们的非犹太邻居一样，产生了忧虑和不满。^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939年上海租界的一些国家代表团体专门探讨了上海

^① 马荣：《美国与埃维昂会议》，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第34页。

^② 徐亦亭：《开封犹太人和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40-46页。

^③ 宋庆龄说：“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经被逮捕……在集中营中受到酷刑……他们的情况证明了目前遍布德国的野蛮行为。……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谋杀。……至于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励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征象。……天天都发现尸体，都是被残害得不可辨认的。”参阅宋庆龄：《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49-51页。

^④ 孙科说：“最近欧洲因法西斯势力之强盛，犹太民族更饱受无情之虐待，以德国为最甚，自希德拉（即希特勒）并奥后，屠戮奥犹，变本加厉，最近更借口德驻大使秘书为犹太人杀害，发动大规模之排犹运动，其手段之毒亘古未闻。”参阅《国民政府筹划犹太人寄居区档案选辑》，《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第11页。

^⑤ 邵东林：《难民危机：全球关注的热点》，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⑥ 史蒂夫·霍克施塔特：《上海：犹太人的绝处逢生之地》，宋立宏主编：《从西奈到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12页。

^⑦ 史蒂夫·霍克施塔特：《上海：犹太人的绝处逢生之地》，宋立宏主编：《从西奈到中国》，第309页。

^⑧ 文俊雄：《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二），《民国档案》2000年第1期，第38页。

^⑨ 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许步曾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

的犹太难民问题，最终决定将限制难民继续入境。

当上海难以继续接纳更多的犹太难民的时候，中国人民中的一些进步人士已经在思考能否以及如何安顿源源不断到来的犹太难民。

（三）犹太难民移民计划有利于国民政府

为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积极奔走的德国犹太银行家雅克布·保格拉斯（Jacob Berglas）向国民政府表示，来华避难的犹太人每个人将携带 50 到 100 不等的英镑，国民政府可以从中免费获得一笔数量可观的外汇收入。另外，犹太人教育程度较高，在各领域也有一技之长。如果犹太难民移民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国民政府也可以争取到相关领域的人才，以建设中国后方。^①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有遗训，要求扶助弱小的民族。他生前也曾经对犹太民族表达过同情之心。^②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理应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而中国自古就有人道主义救援精神。所以，国民政府认为制定和实施犹太难民移民计划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也考虑到帮助犹太难民也可以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有助于中国获得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好感。^③

二、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的拟定

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陲，那里人口相对较少，气候适宜人类生存，又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的建设，方便了云南的交通往来。鉴于此，1939 年 2 月 17 日，孙科在一次常务会议上提出在西南边区划定一个区域作为犹太难民的寄居区的提议。孙科的这项提议得到了国民政府一些高级官员的重视，并召开会议拟定了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的基本内容，决定在云南腾越（今腾冲）和蒙自之间的土地划作寄居区，并把无国籍的犹太难民^④作为援助的对象。会议还规定犹太难民入境后，政府应该协助介绍相关工作，但难民不可进行政治活动，不得反对三民主义；犹太难民也可以按照法律程序办理入中国籍的手续，和一般国民享受同等的权利。^⑤1939 年 5 月份时，响应该项计划的犹太难民已经有 1.4 万人滞留在上海。

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得知中央政府正打算在西南划出一块犹太难民的寄居区之后，他曾经向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致了一封电文，并表示云南面积广大，但是人口较为稀少，尤其是南防、思普一带。这些地方土地肥沃，所以可以在那里安置犹太难民，开垦云南的良田。^⑥

1939 年 7 月 21 日，行政院规定无国籍的犹太难民可以享受特殊待遇；而有国籍的犹太难民的待遇则和其他外国人一样。来华避难的犹太难民，都应该住在通商口岸。行政院在 8 月 1 日（第 424 次会议）又规定，每个犹太难民应该携带

第 84 页。

^① 若雪：《1939 年：犹太难民移华始末》，《湖北档案》2012 年第 1 期，第 45 页。

^② 孙中山在 1920 年 4 月 24 日写给《以色列传讯报》主编、上海锡安主义组织主席伊斯拉的信函中说：“余愿就这项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向阁下伸致同情之忱，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重建你们伟大而历史上著名的国家，必然会给予全心的支持与热烈的欢迎。这一国家，在世界文明方面具有重大的贡献，也应该在国籍[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伊拉斯英文原文为 N. E. B. Erre，收信地址为 29, rue Moliere（即莫利哀路 29 号，今香山路 7 号）。“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参阅孙中山：《致伊斯拉函》（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1919.1-1921.11），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56-257 页。

^③ 《国民政府筹划犹太人寄居区档案选辑》，第 11-12 页。

^④ 国联救济机关或其他著名慈善团体能够证明犹太难民品德端正又没有国籍，即可视为“无国籍的犹太难民”。参阅《国民政府筹划犹太人寄居区档案选辑》，第 13 页。

^⑤ 《国民政府筹划犹太人寄居区档案选辑》，第 13-14 页。

^⑥ 殷昭鲁、赵飞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计划容留 10 万犹太难民始末》，《文史月刊》2007 年第 2 期，第 55 页。

200 英镑作为居住和生活等方面的基本开销。^①

7 月 14 日，上海犹太人创办的《以色列传讯报》(Israel's Messenger) 首次刊登了相关报道。美国人在上海创办《密勒士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 也报道了国民政府的这项计划。^②这些报道令上海的犹太难民欢欣鼓舞。雅克布·保格拉斯为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还亲自前往云南进行实地考察，受到了云南省财政主管缪云台的接见。经过一番仔细地考察，雅克布·保格拉斯认为云南是犹太难民的“应允之乡”，并拟定了《移植中欧犹太人来华之计划》，认为云南能够接纳至少 10 万的犹太难民。上海犹太组织还派遣人去重庆游说高层官员，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实施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③

三、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的搁置

(一) 国民政府高层难以形成稳定而坚定的共识

虽然国民政府高层就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国民政府内政部认为，应该在云南腾越商埠划定寄居区，按照警察机关为基干进行管理，而且政府应该为犹太难民修建住宅。

外交部认为犹太人善于经商，恐怕不利于国家的商业管理；为了防止犹太人日后发生要求民族自决或自治的情况，应该只允许没有国籍的难民寄居到指定区域；有国籍的难民则应居住在通商口岸，否则会留下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而且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一事，在国际上宜侧重于宣传人道主义救济方面。

军政部则不愿意为犹太难民提供寄居区，认为无国籍的犹太难民才可以滞留中国，而且还不能被授予居住权。

财政部反对在接近国际路线的地方划作寄居区，反对让犹太难民享有垦地所有权；而犹太难民的国籍问题，则应提交外交部办理。

交通部认为应该和犹太团体就居住区地点和生活设施等问题进行商谈，然后再做决定。^④

行政院把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传达给了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根据上述已知，龙云建议犹太移民来开垦云南的荒地，以便地尽其用，不至于荒废。蒋介石不反对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但也并不热心。当孙科亲自到黄山别墅去请教蒋介石的意见时，蒋介石表示自己眼下最关心的是国内战局。^⑤从 1938 年开始，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了持续五年的空袭，造成无数平民死伤，也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紧张的神经。重庆政府准备疏散民众，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也建议将与军事无关的各个机关一律疏散，迁出重庆。^⑥相比犹太难民移民的问题，抗战的形势显然更为紧迫。

可见，国民政府高层对这一项计划虽然有心，但是各部门的具体意见并不完全统一，而且还存在着矛盾。龙云的意见则和国民政府高层的意见不大相同。蒋介石更多地是关注国内的抗战形势。因此，国民政府高层没有对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形成稳定而坚定的共识，这就妨碍了计划的实施。

^① 殷昭鲁、赵飞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计划容留 10 万犹太难民始末》，第 55 页。

^② 《以色列传讯报》在 1939 年 7 月 14 日第 14-15 页，8 月 16 日第 1、9、14、16-17、21 页，10 月 13 日第 16 页报道了此事。美国《密勒士评论报》刊载的《100 万犹太人可能在中国找到家，云南会成为难民的应许之乡，德国银行家令人鼓舞的动议》(One hundred thousand Jews may find home in China, Yunnan to be "Promised Land" of Refugees, German Banker Inspires Move) 等文章，也报道了此事。

^③ 房建昌：《近现代外国驻滇领事馆始末及其他》，《思想战线》2003 年第 1 期，第 114 页。

^④ 《国民政府筹划犹太人寄居区档案选辑》，第 13 页。

^⑤ 刘亦实：《在大西南安置犹太人计划的幕后》，《文史月刊》2002 年第 10 期，第 56 页。

^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 5 册民国 28 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第 76 页。

（二）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缺少启动资金

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缺乏启动资金也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民国初期的金融市场非常复杂而紊乱，国民经济发生困难。^①如今又碰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导致军费开支逐年攀升，最高时达到 87%；国民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都上升到 70%到 80%；1937-1940 年度，平均亏短数占实支总额的 74%。^②国民经济体系日益走到崩溃的边缘。至 1938 年底，中国工业生产能力 92%的地区都已经沦陷，国民政府主要税收来源平均减少了 76%。^③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民政府才会要求来到中国避难的犹太难民需要携带 200 英镑的财富，这比雅克布·保格拉斯允诺的金额多出了好几倍。如果把启动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的费用全部都由国民政府来承担，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犹太难民自从受到纳粹分子的迫害和驱逐后，大部分财产都已经被侵占了。当他们被迫逃离欧洲登陆上海的时候，他们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金钱，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穷困潦倒。^④W.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 (W. Michael Blumenthal) 说道，“在 1938 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将一无所有地离开，身无分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可怕的前景。”^⑤上海犹太社团、非犹太救援组织或慈善团体虽然也为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力量毕竟有限。上海的犹太难民虽然也获得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等地的慈善团体或知名人士的经费捐赠，但是要把 10 万的犹太难民全部移居到云南并安顿好，这在经费上还是远远不够。^⑥

（三）严峻的国内形势

云南省在当时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具有割据性的地方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方面都拥有很强的自主性。云南“所有的军事、行政、财政、人事，都与蒋介石中央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状态，对蒋介石貌合神离，阳奉阴违，加上民主运动在昆明开展，使昆明有‘民主堡垒’的称号。”^⑦这些都让蒋介石甚感不安。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亦西迁重庆，云南、四川诸省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后方重地。中央力量一步步渗入地方，打破了地方势力独享一方的局面，中央和地方的摩擦和冲突不可避免。蒋介石和龙云的矛盾主要表现在财经、军事、政治立场和对民主运动的态度四个方面。^⑧

在蒋、龙矛盾的前提下，关于犹太难民移民计划的问题，重庆中央政府和云南必然不会达到一拍即合的效果。1938 年 5 月，龙云曾违背蒋介石倡导的“抗战到底”的信念，欲组成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联盟，发起和平运动。⁶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 年，第 302-304 页。

^②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 11 卷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65 页。

^③ 刘殿君：《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统制》，《南开经济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61 页。

^④ 史蒂夫·霍克施塔特：《上海：犹太人的绝处逢生之地》，宋立宏主编：《从西奈到中国》，第 304 页。

^⑤ Interview with W. Michael Blumenthal, Shanghai Oral History Project, Berlin, 3 February, 1995, pp. 4-5. 转引自史蒂夫·霍克施塔特：《上海：犹太人的绝处逢生之地》，宋立宏主编：《从西奈到中国》，第 299 页。

^⑥ 雅克布·保格拉斯经过考察之后，估计安置 10 万犹太难民所需的费用至少为 5000 万法币，有一半左右的经费没有着落，他还寄希望于云南省政府能够贷款。参阅若雪：《1939 年：犹太难民移华始末》，第 46 页；约翰·阿哈勒斯 (John Ahleps) 在《中国星期论坛》(The China Weekly Review) 上发表的文章认为，该项计划至少需要 3500 万美元。参阅唐培吉等：《上海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 年，第 125 页。

^⑦ 谢本书：《龙云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63 页。

^⑧ 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 (1927-1949)》，台北：国史馆，2000 年，第 198 页。

月和7月，龙云又和四川军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联络，组成云南、四川、西康三省联合反蒋同盟。^①12月发生了“汪兆铭出走事件”^②。这一事件在虽然在1939年5月得到暂时地平息，但是加深了重庆中央与龙云之间相互猜忌与隔阂的程度。在重庆和云南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的情况下，再添加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明显就有节外生枝之嫌。龙云虽然口头上赞同这项计划，但并没有多少实际上的举动。蒋介石也并非像孙科和孔祥熙等人那样对这项计划有那么多的积极性。

1938年以后，云南的外来人口在短时间内猛增起来，总计涌入滇境的军民不下100万人。这时，外米无从进入，内地运粮转运维艰。^③人口的骤然增加，必然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再加上抗日战争的紧张形势，云南也面临着物价高涨和运粮困难等问题。^④如果此时数以十万计的犹太难民移居云南，则无疑会给当地增加压力，使原本矛盾的局势更为复杂化。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犹太难民较为理想的避难地点之一，除了已经存在的犹太社团和拥有便捷的海外交通条件之外，还和当时多种政治力量并存有很大的关系。上海不仅仅是一座经济较为发达的国际化城市，更是一座被一系列不同政权包围和统治的城市。资本主义列强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拥有多种政治经济利益，租界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列强可以在自己的租界内行使自己的管辖权，上海也因此被称为“国中之国”。“由于对货物、金钱以及人员的国际性流动缺少法律限制，上海还成为世界上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大都市之一。因为进入上海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所以这个城市成为20世纪冲突混乱的年代里难民的避难所。”^⑤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西南地区成为中央政府的后方重地。中央内部蒋介石和汪兆铭之间存在矛盾，^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还存在着明争暗斗的利益之争。在这样复杂的国内形势下，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就不可能得到妥善地安排和实施。

（四）严峻的国外形势以及计划的搁置

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被搁置，也与德国和日本方面的因素有着重要的关系。

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在军事、经济、工业、文教等方面的往来也很频繁。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国是中国军火提供商中的大宗，1937年运送到中国的战略物资价值为8278.86万马克，包括各种武器和弹药。^⑦因此，蒋介石对德国人颇有好感，希望德国人能够给日本人施压，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但是1938年以后，中德关系有了转变。1938年德国发表声明承认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政府，德国的军火也被禁止输入中国。这说明随着中国战局

^① 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第172-173页。

^② 1938年12月18日，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自重庆出走，道经昆明与龙云有一夕之谈，停留一夜后转赴越南河内；次年转往上海、南京，与日本人接触，意图建立政权，此所谓“汪兆铭出走事件”。这一事件使重庆与昆明之间互不信任的情绪更为加重。

^③ 谢本书：《龙云传》，第138页。

^④ 1939年3月2日龙云在一封电文中表示，“滇省近来百物昂贵，米价陡涨，生活增高。……地方食粮已极感困难。”参阅龙云：《龙云为各军补充兵宜驻黔训练电》，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档案史料丛编：滇军抗战密电集》，内部出版，1995年，第238页。

^⑤ 史蒂夫·霍克施塔特：《上海：犹太人的绝处逢生之地》，宋立宏主编：《从西奈到中国》，第301页。

^⑥ 蒋介石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汪兆铭则主张与日本议和，他表示：“日本的困难是如何结束战争，而我国的困难是如何支持战争。”参阅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全译本第11册），中央日报社译，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第191页。

^⑦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454-456页。

的进展，德国看到了日本在远东战场的重要性。^①国民政府担心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会影响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甚至会导致德国帮助日本来打击中国。考虑到这一点，国民政府对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不得不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甚至显得畏缩起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由于战争吃紧，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连连失利，大片国土和许多重要城市都沦陷于日军手中，所以谈不上有多少的精力来打理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而日本也正在谋划“河豚鱼计划（Fugu Plan）”^②，企图利用犹太难民为侵华战争服务，但是上海的犹太难民却大都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日义举，并声讨日本的侵华行径。日本认识到难以实行“河豚鱼计划”，必然会阻挠中国的“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不让中国占到便宜。

蒋介石得知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Oskar P. Trautmann）来电抗议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后，他便指示孙科、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暂时将计划搁置。^③1939年8月21日，已占领上海的日本当局和上海一些国家代表宣布拒绝任何新的犹太难民进入上海，这相当于关闭了犹太难民落脚中国的重要门户。后来，犹太人来华的海路和陆路也逐渐被意大利和德国所控制。犹太难民来华的人数骤然锐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对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国民政府提出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是基于上海难以容纳更多的犹太难民的现实需要，也考虑到了自身和国际上的因素，并非一时性起，也非主观盲目。犹太难民们也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国政府作出的这项决定。这项计划之所以被搁置，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民政府高层内部难以形成稳定而坚定的统一意见，使得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缺乏实施力。而实施为数十万人的移民计划，本身就很不容易。国内严峻的抗战形势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隔阂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国民政府的精力，因而难以腾出手来专注于实施这项计划。国际上德国、日本等方面的限制性因素，也阻碍了它的有效实施。因此，即使国民政府真的有心去做这样一项计划，在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中也很难有足有的时间、精力和资金顺利完成。

云南犹太难民移民计划最终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被迫搁置了，其积极意义却不能遭到断然地否定。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犹太难民深深的同情和援助之心，是二战期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之间深厚友谊的象征。

作者简况

^① 易豪精：《从“蜜月”到断交：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62页。

^② “河豚鱼计划”是日本图谋在我国东北占领区建立犹太难民安置区的一项计划。日本打算凭借该计划利用犹太人的财力、影响力和人才为侵华战争服务，构建日本人心中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犹太难民几乎全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反对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关于日本“河豚鱼计划”的提出、内容和评论等，可以参阅马文·托克耶、玛丽·斯沃茨：《河豚鱼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龚方震、张乐天、卢海生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

^③ 刘亦实：《在大西南安置犹太人计划的幕后》，第59页。